



中国价值的革命

The Revolution of China's Values

高德步◎著



人民出版社



中国价值的革命

The Revolution of China's Values

高德步◎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 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价值的革命/高德步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3

ISBN 978-7-01-015996-6

I. ①中… II. ①高… III. ①社会主义建设—价值论—研究—中国
IV. ①D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49330 号

中国价值的革命

ZHONGGUO JIAZHI DE GEMING

高德步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40

字数:590 千字

ISBN 978-7-01-015996-6 定价:96.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目 录

序 论	1
第一章 中国价值	20
第一节 中国价值之原	20
一、价值起源	20
二、价值形式	28
三、价值与价值观	34
第二节 中国价值的系统传承	42
一、道统、治统、学统	42
二、经典文本与价值传承	52
三、经与史：价值与传统	60
四、士人精神与价值传统	67
第三节 中国价值的传统与革命	74
一、历史发展与历史轴心	74
二、价值革命与价值轴心	77
三、价值革命的思想资源	83
四、中国传统价值的基本内涵	90
五、中国价值传统的多元统一	102
第二章 中国价值传统的形成	107
第一节 周文革命	107
一、殷周变革	107
二、人文礼乐的形成	111

三、王官之学的确立	119
第二节 儒家革命	124
一、春秋战国变革	124
二、道术将为天下裂	132
三、克己复礼为仁	140
四、儒学的综合与独尊	148
五、儒家化社会的形成	161
六、儒学的异化与分裂	170
第三节 理学革命	181
一、唐宋变革	181
二、儒学解构，佛老流行	185
三、经学变古，价值重构	194
四、理学独尊与文化合法性重建	207
五、心学兴起与理学空疏	215
第四节 清代学术的鼎盛与危机	222
一、学术批判与复古解放	223
二、崇儒重道与文化合法性重建	228
三、汉学兴起与价值祛除	236
第五节 传统时代的“启蒙”思想	242
一、宋代的理性“启蒙”	242
二、晚明的感性“启蒙”	244
三、明末清初的“民主”意识“启蒙”	246
第三章 中国价值的现代转型	248
第一节 千年变局与价值分裂	248
一、传统学术的困局	248
二、传统价值的分裂	253
三、晚清价值变革的本质及其局限性	265
第二节 五四：批判传统与现代启蒙	268
一、彻底反传统：离经叛道之始	268

二、现代性启蒙：中国式启蒙的特点	279
三、五四的历史局限与逻辑缺陷	289
四、科玄论战与三大社会思潮的形成	294
第三节 三民主义的价值形成	298
一、五四后的社会分化	298
二、三民主义的价值体系	302
三、三民主义的儒家化	309
第四节 新民主主义的价值形成	315
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价值	315
二、新民主主义的哲学基础	320
三、新民主主义的核心价值	329
四、共产党：传统与革命	336
第五节 社会主义的价值形成	342
一、马克思主义建设现代性	342
二、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	346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形成	354
四、社会主义现代化：价值之损益	363
第四章 中国价值的革命	372
第一节 危机与重建	372
一、时代悖论	372
二、价值危机	376
三、政权合法性挑战	383
四、意识形态的重构	391
第二节 价值革命的逻辑进程	398
一、价值重估：新启蒙	399
二、传统重建：新传统	406
三、综合创新：新综合	414
第三节 现代价值的超越与重构	421
一、目标：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	421

二、转折：感性解放与仁性复归	426
三、重构：理性重建与新理性	431
第四节 传统价值的复归与重建	442
一、正德	442
二、利用	450
三、厚生	456
四、惟和	461
第五节 社会价值的多元转向	468
一、价值多元的哲学基础	468
二、价值多元的经济社会基础	470
三、现代社会的多元价值转向	472
第五章 中国社会的转型	475
第一节 现代化：异化与回归	475
一、现代化之道	475
二、现代性的异化	479
三、从异化到复归	488
第二节 回归生活世界	494
一、生活世界的意义	494
二、回归感性生活	499
三、回归和谐生活	504
第三节 生活方式变革	510
一、生活方式的文化价值	510
二、消费方式变革	517
三、居住方式变革	526
四、自由与休闲	535
第四节 生产方式变革	542
一、财富观的转变	542
二、生产目的转变	552
三、生产方式转变	560

四、劳动异化的消除	567
五、走向自由王国	574
第六章 中国价值与世界	576
第一节 中国与世界	576
一、“中国”观的历史演变	576
二、“天下主义”到“世界主义”	583
第二节 天下主义重建	591
一、王霸之道的现代转型	592
二、中国价值与协和世界	602
三、王道理想与天下主义重建	610
参考文献	616
后 记	629

序 论

每个民族在其历史发展中都必然形成一个价值传统，正是这一价值传统主导着不同历史阶段的意识形态，指引着不同时代的社会发展。这一价值传统发端于民族的起源处，随着民族的延续和发展而不断演进，但其核心内涵和基本特征却始终保持。从中国价值传统形成和演变来看，虽经数千年历史和数十次改朝换代，尽管有起有落，兴衰更替，但“吾道一以贯之”（《论语·里仁》），从而形成一个“价值轴心”。这就是中华道统之传承和意识形态之主流，也就是沿着中华民族的“血脉”而形成的“文脉”。然而，中国的价值传统在近代之前即已走向衰落，从而不能为中国的社会变革和社会发展提供思想资源。所以，近代以来中国价值传统经历了向现代转变的过程：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现代价值经中国化而逐渐成为主导价值，指引中国的现代化方向和进程；另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现代价值也一度影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并使中国价值传统加速减损和消解。中国要享有现代化的成果并消除现代化带来的消极影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要用现代发展观点，重估中国的价值传统，并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加以重建，使之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方价值源于“逻各斯”，而中国价值源于“道”。老子说：“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

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老子》二十一章）这里高度概括了道的本质含义，即物、象、精、真、信，从而指出了从“形而下”到“形而上”的价值形成路径。

道是宇宙万物之源，也是价值之源。道是一种存在，但首先是一种“形而上”的存在，是“不可道”的。但是“不可道”之道必须有“可道”之道来体现，这就是道体。这种有象有形，可名可道的道体，就是天地与人。道体就是天地人的总称，天在上，地在下，人在其中。天可以“形而上”为神和天帝，地可以“形而下”为器和物，而人是万物之灵，只有有了人，天地才有价值，没有人一切都无从谈起，一切价值都不存在。但人的价值依附于天地，没有天地，人的价值就没有基础，就无所依托。所以老子说：“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老子》二十五章）

惟人万物之灵，由于有人在天地之间，天地就有了灵，也就是有了心，即所谓人“为天地立心”。所以，天地之心源于人心，天地之心必须通过人心来反映。这就有了人心与道心的区别。道心就是天地之心，是恒久不变的价值本身，是不变价值；而人心就是人对万事万物的价值判断，是可变价值。在人与自然为一体时，人心就是道心，但随着人的异化，人心就可能脱离道心，从而与道心相异。所以《尚书》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对此，程颐说：“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灭私欲则天理明矣。”（《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四）

道体是天地人的总称。但天地人是以人为本的，道体也必然是以人为本的。而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以人为本就是以民为本，人民构成道体的现实主体，而作为反映价值的人心也就具体化为民心。老子说：“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老子》四十九章）孟子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离娄上》）孟子还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公孙丑上》）这种“不忍人之心”就是“仁心”，“不忍人之政”便是“仁政”。这就是说，民心代表天意，施仁政就是合民心，合民心就是合天地之道。

道不可变，但天地与人的关系是可变的，所以，作为价值实体的道体也是可变的。既然道体可变，就有道体之流行。道体流行“如水之流而不息，便见得道体之自然”（《朱子语类》卷第三十六，《论语》十八）。所以，道体流行也就是宇宙间的道德秩序的生成和发展，也就是社会价值观念的演变，总之就是社会关系和价值思想的历史。朱熹说：“理不可见，因其爱与宜，恭敬与是非，而知有仁义礼智之理在其中，乃所谓‘心之德’，乃是仁能包四者，便是流行处，所谓‘保合太和’是也。”（《朱子语类》卷第二十，《论语》二）可见，道体流行就是价值思想的流变，经过一定历史时期的传承，最后汇结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意识形态，并构成历史上“一以贯之”的价值传统即道统。

社会发展依道而行。但社会发展并不单纯地是一个客观的过程，还受到人们主观意识的影响。社会大多数人的主观意识决定人们的共同行动，而共同行动则构成社会发展和运动。但人们的主观意识是由人们的价值思想决定的，所以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到人们的价值思想与人们的社会活动之间相互影响的互动关系：社会变革与发展遵循的是道，治道围绕不变的天道，时而偏离时而回归，从而形成一个历史轴心。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看到，价值思想的演变也遵循着一个道，社会价值围绕这个道变化，时而偏离时而回归，最终形成一条“一以贯之”的价值轴心。这就是道统。

任何社会都必须有一个价值系统的支持。这个价值系统包含着一个核心价值，这个核心价值决定整个价值系统的运行并主宰着社会的发展。在中国历史上，这个价值系统源于“前轴心时代”上古先民先圣的社会实践和生命体验，并经历三代而基本形成，这就是体现为周礼的国家意识形态体系。孔子在《论语·尧曰》中引述尚书的历史记载：“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这里是说，尧、舜、禹的传承是“天之历数”，而所传承的价值就是“允执其中”，只有坚持这个价值，才能保证社会安定，人民幸福，永享天禄。这应该是中国价值传统的源头，也就是中国道统的起点。孟子倡导王道和仁政，提出圣人传道的路径：“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

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孟子·尽心下》）这里，孟子沿着孔子所述的统绪，再次提出了圣人之道传授次第。唐代思想家韩愈明确提出“道统”观念，他说：儒者之道，即是“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原道》）。可见，在“轴心时代”即春秋战国时期，经孔孟等进一步系统化，这个价值系统进一步演变为以仁为核心的价值体系，并最终形成了代代相传、不绝于缕的价值传统即中华道统。从中国历史上看，尽管道统有时会中断，有时会变形，但终究要回到固有的主体轨道上，即回归主流，也就是回归道统。历朝历代的社会治理理念和方式都必须符合这个道统，也就是符合这个主流价值，否则就必然走向衰落甚至败亡，即荀子所说：“道存则国存，道亡则国亡”。（《荀子·君道》）

而在价值传统即道统传承过程中，士人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历史上的优秀士人无不以天下为己任，代表着社会最普遍的诉求。他们综合这些诉求，从中求出最大的公约数，并将这个公约数系统化为社会的普遍价值。他们通过对人民日常社会生活的实际体验，以及对人民自强不息的奋斗历史的理解，运用自己的学术思想提炼并阐释出中国价值及其传统，不断地创造着文化精神和其他知识体系。他们还通过经世致用的个人价值实现方式，将这些价值思想转化成为国家意识形态，成为民族和国家的主张。在他们看来，道义是最高的价值形态，所以在实现自己的价值理想过程中坚持以道为精神价值，坚持“从道不从君”。他们抱定“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目标，坚持信仰，追求真理，坚持道德标准，追求价值理想，将天下为己任，通过自己的修身进德和价值实践，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存在方式和思维方式，从而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特有的士人精神。这种士人精神，本质地反映了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念中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是民族传统价值观念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士人精神构成中国价值传统的核心部分，中国士人就是中国价值传统的人格化载体。

—
—

一个民族经过一定历史时期的发展和沉淀，必然形成一定的文化传统。文化的核心就是价值，因而也可以说，价值传统构成文化的基本传承。但是，随着社会发展变化，社会价值也会发生变化，原有的价值传统不适应新的社会需要，因而会发生价值失衡、倾斜、颠覆，直至彻底瓦解和崩溃。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新的价值会在这种社会变迁和价值倾覆过程中萌生、发展直到成熟，并成为新的社会主流价值并归入价值传统。所以，价值传统是“苟日新，日日新，又一新”的。而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其中某些历史时期的重大变革构成价值革命，并导致民族价值获得整体上的提高或飞跃，也将社会发展推向一个更新的历史阶段。

中国传统社会经历了三次重大的变革，即殷周变革、春秋战国变革和唐宋变革。通过这三次社会变革，中国进入三个社会发展阶段，即封建社会、世族社会和齐民社会。^①与历史上的社会变革相对应的社会价值思想也经历了三次革命，即周文革命、儒家革命和理学革命。

第一次价值革命发源于中华民族的源头，完成于商末周初，其标志性事件是文武周公的制礼作乐，可以称之为“周文革命”。“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易·革·彖辞》）。在这里，“人”出现在“天”后面，说明在“天命”后面起作用的是“人事”，从而确立了人的价值，实现了从“神本”到“人本”的转变。与此同时，周初以人为核心，建立“亲亲尊尊”的宗法礼制，奠定了中国社会的伦理价值基础。另外，殷商好武，周人尚文。周初政治家提出敬天保民，以德治国，倡导人文，推行教化，即所谓“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不仅实现了从“神治”到“人治”的转变，同时也实现了从“武治”到“文治”和“德治”的转变。总之，周

^① 参见高德步：《中国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政治经济学评论》2014年第1期。

文革命奠定了中国数千年的人文价值传统。

第二次价值革命发生在春秋末期到战国初期，完成于西汉中期，即儒家革命。春秋战国时期，周文疲敝，礼崩乐坏，天下大乱，道术为天下裂，人们不能不重估一切价值，对周文所建立的礼乐制度作出重估。在这种情况下，思想界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格局。在诸子百家中，孔子继承了周文革命奠定的人文传统，建立了以“仁”为中心的儒家价值体系，实现了从“人本”到“仁本”的提升。但在“大争之世”，中国社会并没有采纳儒家思想，而是利用法家理论实现了国家统一，通过黄老思想完成了经济恢复和社会发展。直到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儒家思想最终成为中国的统一价值和官方意识形态。所以说，尽管孔子未实现“克己复礼”的目标，却成功地“为汉制法”。总之，儒家革命创造了一套以“仁”为核心、以三纲五常为制度化载体的完整的伦理价值传统。

第三次价值革命从唐中期开始直到两宋完成，持续了二百多年，即理学革命。魏晋以后，中国进入长达数百年的混乱时期，北部游牧民族进入中原，南北分裂甚至天下大乱。而在思想界，一方面儒学分化，自我阉割，经学衰落，传统价值失去进一步创新的能力；另一方面，佛道两教盛行，中国价值传统受到冲击，致使道统衰微，命悬一线，中国再一次陷入道术为天下裂的局面，中国士人不得不承担起“为往圣继绝学”的历史使命，建立了以“理”为核心的价值体系。这个理以“天理”为最高价值，以性理、情理、事理以及物理为普通的世俗价值，即包括“形而上”的理，也包括“形而下”的理，使儒家的伦理价值传统进一步理性化，实现了从“仁性”到“理性”的转变。

从中国历史上三次价值革命和价值传统的形成和兴衰来看，所谓价值革命就是原有价值传统从破坏到重建的过程。价值传统的破坏，首先源于内部问题，即原有价值不能解决现实社会矛盾，不能引导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发展，而在受到外来思想挑战的情况下，往往走向衰落甚至中断。然而，价值传统的这种破坏和中断，往往为价值传统的创新转化创造了条件。所以，价值传统破坏和中断，也就是价值传统重建的开始。价值革命一般会经过四个阶段或四种方式，即价值重估、价值损益、价值回归、综

合创新。价值重估就是对传统价值进行重新估价，一般采取批判和否定的形式，将这一切传统消解之后，再对新旧价值进行有损有益的变革。在这个阶段，一般是“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即新的价值不断发展，而传统价值不断减损消解。而当传统价值完全消解之后，面对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人们会对传统进行重新估价，所以就有一个价值回归的过程。由于的价值传统的破坏，原有主体价值的消解，社会上会出现各种思想的竞争和碰撞，而最终会通过一种综合创新来完成这种思想的整合，并形成新的价值体系并构成新的价值传统。从中国历史上三次价值革命的过程来看，周文革命是综合了三代以来的各种思想成果而成，儒家革命是综合了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思想而成，理学革命是经过儒释道的综合创新而成。

任何时代的价值革命都不可能凭空产生，一方面要有社会时代需要，另一方面要有一定的思想资源。所谓社会需要就是源于历史发展过程中人民大众的利益诉求，这种人民大众的利益诉求转变成社会思潮，并经过思想家的思维创造成为某种价值思想和学说。这就是“礼失而求诸野”。但是，在社会历史过程中，原有的价值体系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而在社会变革需要面前往往作为保守的思想力量出现，所以，原有的价值体系的打破可能需要借助于外来思想。这就是“礼失而求诸夷”。经历一系列思想变革，社会变迁可能出现“矫枉过正”和“过犹不及”现象，这必然导致人们对于过去的回顾，从而导致回归传统的思潮出现。这就是“礼失而求诸史”，亦即求诸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其结果是价值传统的回归。但是，这种回归并不是简单的回归，而是以复古为解放，以复古为创新，最后形成新的价值传统。这个新的价值传统一方面是道统的延续，另一方面是道统的更新。

总的来看，在数千年历史过程中，中华民族和历代先贤们通过三次价值革命，分别建立了人文价值传统、伦理价值传统和独特的理性价值传统。从另一方面看，这三个历史阶段的价值传统，通过历史的选择和积淀，最后形成了中国的传统价值。所谓传统价值是经历史上的价值革命而形成的恒久不变的价值，是价值传统延续提升和积累而形成的价值体系。中国的传统价值体系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

中国古代哲人很早就指出：“惟人万物之灵”（《泰誓》），“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圣治章》）。但中国人并不是把人看作与自然对立的主体，而是将人看作世界的一个部分，追求一种“天人合一”之境界。在这种状态下，人们重人伦，重情分，泛爱众，追求一个“天下归仁”的仁爱世界。在这里，仁性源于人性，但不等同于人性，仁性是经教化而得到升华的人性，既源于普世的爱，更是最高的善。所以，“以人为本”也就是“以仁为本”。这种“仁性”系统，经“形而上”的理性化过程进一步上升为以“天理”为最高价值，以性理、情理、事理为世俗价值的“理性”系统，并融入理想的天人之境。

第二，“中庸和谐”的价值观和方法论。

中国价值传统是长期形成的，每次价值革命都通过损益而得到进一步提高和升华。《中庸》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可见中和是古人所追求的最理想状态。“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在这里“和”是价值，是目的，而“中”即是方法也是价值。一方面，“和”必须通过中庸之道达成，而中庸也只有在“和”的状态下实现。另一方面，所谓“致中和”，就是将目的、方法和过程统一起来看，“中”也就具有了价值意义，即“中庸之为德也”（《论语·雍也》）。但要通过“中”庸之道实现“和”，就必须承认“不同”为前提，即“和而不同”，只有“不同”，才有“和”，正所谓“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所以，中国传统承认价值的多元性，使人们各得其所，各得其乐，合作而不争，从而实现和谐发展。

第三，“自强不息”的生命价值和历史观。

人的存在，既包括人的自然存在，也包括人的社会存在，还包括人的历史存在。所以，在“以人为本”的价值体系中，除体现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的两维关系外，还有人与历史的第三维关系。人与历史的关系，本质上就是人的生命延续和人在历史过程中的位置。生生之谓易。“易”就是历史，就是一个民族在生命延续的同时，自强不息，革故鼎新，不断创新，不断进化，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华民族根据自身的生命体验和历史过程，形成了以“人事为本”的人本史观，“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

以化成天下”，“彰往而察来”，以“理”以“仁”，中庸中道，处理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的关系，处理当下与过去和未来的关系，在实现“三维和谐”的状态下不断延续和发展。

价值指引人民，价值指引中国。一方面，中华民族经数千年来反复磨砺，形成了自身独特的价值传统，另一方面，这一价值传统指引中华民族不断进化和发展，形成独特的民族性格，它已融入中华民族的血液中，形成独特的文化基因。

三

中国价值传统具有极强的内在生命力，致使其久盛不衰或者衰后复兴，以致绵延不绝。但是到了19世纪中叶，中国封建社会经历长期延续终于进入寿终正寝的时代。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势力加速侵入，大大加速了中国传统社会的解体过程，中国又一次出现“千年未有之变局”。另一方面，西方科学技术和现代思想，使中国价值传统受到严重冲击，又一次出现“道术将为天下裂”的局面。这次社会变革是工业革命导致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生活方式发生根本变化的背景下发生的，是一次更为根本的变革，对中国传统社会和价值传统构成根本性的冲击。在这种冲击下，“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① 总之，一切传统的东西都大大贬值甚至一文不值了。

面对古今之大变局和道术为天下裂的历史局面，中国士人开始思考社会变革，力图补天之裂，一部分人坚持原有的价值传统以抵制外来思想，而另一部分人则对传统价值进行全面的批判式重估。到五四时期，先进知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3页。